

# 抗战时期上海地区日伪关系探析

李峻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日伪双方都认识到上海地区在政权存续方面的重要性，日方将对上海的占领置于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的整体计划之中，伪方也将巩固政权寄托于上海的繁荣上。但是，日伪在有限的利益分配上也有诸方面的问题，如经济利益的矛盾、人事矛盾及汪伪建军问题上的矛盾等，使得上海地区日伪关系错综复杂。

**关键词** 上海 日伪关系 控制 矛盾

抗日战争时期，伪上海市政权追随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和汪伪国民政府，置身于日本侵略者卵翼之中。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在八年战争期间其政权结构、权力变迁及其组织机构、规程条例、人员任免及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政策等方面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日伪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始终是并行的。

## 日、伪控制上海的认识与设想

早在中日战争的烽火蔓延至上海之前，日本侵略者就已将上海这一“东方繁盛地”视为口中育肉，必欲夺之而后快。1937年8月21日，日陆海两军经过紧急磋商，拟出一份《奉答关于处理事变下问要点》，制订了一套彻底征服中国的方案。其中，他们对控制上海的设想是：“确保上海，使其丧失经济中心的机能；于适当的时机，断然实行对中国沿海的封锁，以威胁中国国民及军队的生存，并切断对外经济活动。”11月1日，日外相广田向德驻日大使狄克逊提出对华“和平条件”，希望其转至南京国民政府，上海的权益是其关注的焦点之一，如要求扩大上海非武装地带等。

武汉会战后，日本在3个月内亡华的计谋宣告破产，不得不重新制定了对华处理方针，提出“继续进行消灭残余抗日势力的工作，但主要应以强大兵力为后盾施展谋略和策略”。在这一方针中，上海被划为“治安地域”，是属于要被“确保”的“重要地域”，要“固定配置足够的兵力，且力求形成长期自给的态势”；同时，“以把恢复治安作为当前首要目标的地方分权政治为基准，并根据实际情况，相应地促进局部的安定，以逐次形成所需范围内的实际统一。”由此，日本侵略者将对上海的控制置于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的整体计划之中。

汪精卫投敌后，于1939年底与日方召开愚园路会议，商讨汪伪政府的组成事项。在会议上，日方明确提出了对上海进行控制的设想和要求。他们认为，长江下游是中日之间“经济合作特别密切的地带”，不希望把上海的控制权全部交给汪伪政府，要求继续保留自伪“大道市政府”开始的事实上的“自治”地位，要求汪伪政府通过日本顾问与联络人员与“新上海”的行政机构密切合作，在有关城市建设、长江航运、民航以及一般财政、经济事务等问题上，同日本进行最充分的合作；为了保证合作，日方还要求伪上海市政府必须在其社会福利、教育和警察等部门中，聘用日本联络人员。12月30日，汪日签订《秘密谅解事项》，其中对上海市在伪府中的地位作了规定，即：“日中两国在长江下游地带，特别是上海，有关贸易、金融、工业和交通等经济上的问题进行协商”，由“以官方和民间的专家”组成的“日中经济协议会”决议，交“由中央政府或上海特别市照样采纳实行”。由此可见，日本对上海的控制欲望是强烈的。而且，直到1943年2月13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访华时，还试图策划在上海建立所谓“中日两国的真正合作地带”。

伪维新政府与上海渊源颇深，其成立时，因南京大多房舍被日军所占，只得在上海的日军占领区设置“事务所”，设于虹口新亚饭店，被时人认为“饭店政府”。成立后不久，即按照日本主子的意图，在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南京、上海两市建立地方伪政权，以代替日军占领这些地区后临时拼凑的维持会或自治委员会之类伪组织。

汪伪政府更是非常重视上海的作用。汪精卫叛国后，曾匿居于上海愚园路 1136 弄 1 年多，作为自己在上海指挥组府以及安身立命的场所。他主持的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在上海召开的，与日本侵略者签订的一系列密约也是在上海完成的，最初附逆的一帮汉奸是从上海发迹的。据参加过汪伪政府的金雄白回忆：“上海社会上，有人竟偷偷摸摸地为进入汪系削尖脑袋找门路，有人竟得意洋洋地告诉别人将不日飞升。汪政权建立之前，已经有了不少的攀龙附凤的人。”伪上海市府秘书长赵尊岳于 1941 年 3 月 30 日在公开讲话中声称：“上海市是全中国第一个大都市，中日合作是以它为中心点，亦是它以它为联络点，在这一点上，亦觉得责任重大。”陈公博在为签订实施收回上海公共租界条款告市民书中则重申：“上海是中国的经济根据地，上海是中国最繁荣的地方，是不错的。”这种繁华对于日汪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从实际运作上看，汪伪政府虽然定都南京，许多重要机构却始终以上海为中心。曾任伪上海市府秘书长的罗君强称，“汪伪的班子，是由一群野心文人、落伍军人、失意政客、投机党棍拼凑起来的。他们没有一寸土，没有一个兵，初期所凭借的惟一实力，就是以日本宪兵为靠山的特务组织。上海沪西极司非尔路 76 号，就是它的大本营。”汪伪中央海军学校及其前身伪维新政府的水巡学校也设于上海，每期学生毕业前，汪精卫都亲自接见，对这一伪校所承担的所谓“建设新海军”抱有很大的幻想。再以伪中央储备银行为例，它于 1941 年 1 月 6 日在南京成立总行，随后，上海分行于 20 日成立。其副总裁钱大楷在分行开幕时说，“上海是全国经济金融中心，中储行业务当以上海为重心，分行的地位非常重要。”伪中储行的理监事以及各局、处长都经常在上海办公，所谓南京总行实际只是个招牌。经过 1 年多的时间，伪中储行掌握了上海所有金融机构，形成了一个中储行-中央信托公司-中央储蓄会-中、交两行-小四行的战时金融体制，并从组织、制度上控制、操纵了上海的金融市场，对于伪市府及整个汪伪政权的存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看来，伪方将上海置于重要地位虽不能改变其傀儡地位，但对于其生存和延续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 日本对伪方的控制

伪上海市先后有四任市长走马灯似的上阵，市府名称屡有变更，实质皆为傀儡，重大事项均须向日人请示，且请示信上均须附上日本驻沪各机关大名。政府事宜一般直接向日本驻沪总领事馆请示，警察局遇事要报送日本警察队，更不必说伪市府中虎视眈眈的日本顾问了。日、伪同时糜集上海，在总归有限的利益的分配上必然会产生诸方面的问题。特别因为傀儡政权也有建立自己独立性的企图，使得上海地区日伪关系复杂起来。在当时以实力说话的政治环境中，日本的控制始终是傀儡们挥之不去的梦魇。

其一，横贯整个战时上海的“顾问”制度。

1938 年 10 月 16 日，日方在伪市府设立上海特务机关顾问部。伪上海市政府的各局处皆设有顾问、指导官及代理顾问、办事员。1940 年 11 月 20 日，顾问部撤销，改设上海特务机关联络部。联络官们不少还是以前的顾问。

顾问规则苛严细密，“日常公务，除例行不计外，其有对于会议兴革暨一切极重要事项，有须转向首席公务征询意见，以资商榷而斟完善者，兹特规定：所属各局、处、署，此后按日将经办或发生重要事项择要摘由记录，逐日填具日记二份，每半月汇送一次，以凭存转而资查考。”各项事务，如没有顾问的签字，各种命令都是无效的，这就使日本人能够有效地控制几乎所有各级伪市政府机关，认为“这是既成事实，不应把它当做无理看待”，并将此喻为“初生婴儿不能脱离奶水”。

其二，军特机关操控上海。

占领上海初期，日本侵略者控制上海的主要机构是负责组织各区县自治委员会的宣抚班。“因为军事占领后的行政工作，光有军队是不够用的，所以满铁根据军方的要求，临时派遣了 50 名地方行政部门的干部，命上海事务所给编成班组。这些人差不多都是从满铁富余人员中挑选的，先到上海集合，然后分派到上海近郊地区各县。他们的任务，是与当地的治安维持会以及日本军联系，搜集分担地区的治安情报，斡旋居民生活问题，对占领区居民作各种宣抚工作。”还有“分头领导民众组织自治

会”、“协助维新政府督促鼓励已经恢复的县公署、乡镇等行政机构及大民会等进行民业的恢复、医药设施供应等民众福利设施的开展，或组织护路（铁路、公路）自卫团等。”

如何看待宣抚班及其人员的作用？据日人记载，宣抚班“于军事底定之后，实施压榨，勒令民众具领“良民证”成人纳费一角，童孩减半，如有抗违者，以匪类论。”他们自己也承认，宣抚人员“一般说来，都对中国人民做了许多坏事一依仗日本军的势力，逞威风、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大有人在。”但是，宣抚班毕竟是以与侵华作战部队不同的面貌出现在民众面前的，日本军特称：“根据我的经验，必须是‘军队靠武力，宣抚靠仁德’因此，其侵略性就显得较隐蔽。比如，崇明宣抚班班长仓见定吉，“在寇酋谷川碑前当众演讲，以修身、齐家、致知、格物为标榜。”当时金山县知事陈步青撰写的“军特务班金山班宣抚政绩”中则写道：“自27年2月，军特务班金山班山田义正班长，率同班员松元义盛、野崎甚太郎、加贺谷物郎及译官李成栋等在金，抱日华亲善宗旨，宣传德政，抚辑流亡，对于地方之安危，军民之冲突，灾黎之如何维护，商业之如何复兴，无不周咨博访，措置咸宜，其成绩之最显著，而为金山灾民得其更生基础者，莫如采办耕牛，廉价出售，商请驻军领袖，禁止游兵到乡，使全县三十余万田亩，不致耕种失时，接洽省政府，提拨辅助金，保荐县知事，组织县公署，使本县政治，渐入轨道，而地方秩序，亦得藉以维持，其他如设置贫病施疗处，人民问讯处，会同警备队，分赴四乡，搜剿土匪，协助县公署，办理土地登记，良民登记，施行通行证等，种种解除民困，有利民生之政，笔不胜书。”函极尽阿谈奉承之能事。

其后，宣抚班权限不断缩小，“走上消极退缩之路，原先试行开展的重要宣抚工作几乎全部放弃了。”代之而起的是特务班，其中最主要的是负责扶植和指导伪大道市政府的军特务部西村班，班长为西村展藏，总共34人。

在上海活动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势力最大的一个指挥机构是“梅机关”。梅机关设于1938年10月，首任机关长是影佐祯昭，后来有柴山兼四郎、矢崎堪什、松井太久郎。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梅机关由上海迁至南京，在下面设立了4个分机关，即沪西分机关、南京分机关、苏州分机关、杭州分机关。沪西分机关设于上海市极司菲尔路55号，机关长是金子晴气，任务是控制和指挥汪伪特工总队。梅机关直接组织和扶植了汪伪政府以及“76号”特务机关，汪伪特务的活动由日特梅机关操纵，其各个特工部门和所属各区站，均有梅机关指派的人或宪兵队派驻的宪兵军曹等直接联络，下达旨意。伪特工人员执行逮捕等行动，一律着便衣，必要时由日本宪兵协助。汪特与日特的联系，只有两个渠道，一是梅机关，二是宪兵队，要与其他日本机构和日本官员打交道，如大使馆武官、经济顾问、报导部、兴亚院等，必须通过梅机关，由梅机关会同双方谈判。

### 上海地区日伪矛盾

日本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控制，并不能解决日伪之间的矛盾。上海日伪之间的矛盾体现在多方面，并在不同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

#### 其一，经济利益的争夺。

日伪矛盾首先体现在对经济利益的争夺上。经济是政治、文化的基础，日伪都希望借上海经济的实力巩固统治。因此，虽然总的来说伪方听从于日方，但牵涉到切身利益时，矛盾也是难免的。傅筱庵和日本人的矛盾，即主要表现为经济方面，从傅关于《复兴上海意见》节略中可窥一斑：“要求江海关转口税应全部划归本府收入，要求鸦片附加税应与江苏省同样办理（查江苏省政府方面附加地方税每两计国币2元，而本府方面则每两仅附加国币5角，相差达3倍之多），要求统税应附加一成，为本市建设经费，要求设立市银行发行辅币券调剂市面金融，本市警察经费应由本府统一收支。”这些要求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不过，虽然心有怨感，但没有独立性，没有主权，说什么都是没用的。但日伪经济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到汪伪治下则更明显，主要体现在“商统会”的成立及运行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很快陷入泥潭，乃逐渐改变其对汪伪政策，“强化国民政府”，其中，1943年3月15日成立的“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简称“商统会”）就是重要的一环。其实，“商统会”的成立还缘于前期日伪经济合作的不顺利，希望借助于

所谓民间人士。日本方面称：“如果政府介入的经济合作失败的话，政府的面子将无法挽回，有时还不得不明知失败还要勉强执行，这反而会成为将来的祸根，或者成为破坏行为。如果放手让民间人士去做，即使失败了，但他们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改正，都可以研究向最佳方向发展的对策。因为民间有这个回旋余地，可以抓住这种机会。”母这段话可以很好地解释商统会的成立缘由。

但是，实际情况是日军对商统会的活动处处加以干涉，“一切都是日本军发号施令，都必须服从大使馆的命令。”“商统会”下属机关的各种统制收买机关实际上都是以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社为代表的日本大商行支配之下。此外，日方还自行设立“中贸联”等物资统制机构，把华中的私营加工工厂和运销行号控制在自己手中，形成一个采购、运输、供给和输出的统制物资的网络系统，“商统会”毫无自主权可言。在收买棉纱布期间，“始而藉接洽关于收买日方存货事宜，直接与该会发生人事关系，继而竟至暗中操纵该会业务，于是该会遂无形中为日方所把持，而渐与最初成立该会之宗旨背道而驰矣！”对于米粮的采购，日本控制的更严，它不但划定采购的区域，甚至“由其十三军直接派员主持该会业务”。米粮征购也必须首先满足日军的需要。如1946年征购到25.4万吨大米，22万吨提供给华中占领军。日本对“商统会”的各个统制委员会也进行控制。这些委员会表面上看是由日伪双方组成，主任委员由伪方担任，日方仅担任副主任委员，但由于主要物资仍然控制在日商手中，伪方委员毫无实权。1943年，日本海军强迫收购上海申新一、八两厂，引起华商们的怨愤，也使他们重新认识到本身力量的薄弱。更重要的是，除了“商统会”征购的物资外，日本占领军仍然保留它在“治安不安定”的“接敌地区”内自行搜刮物资以供军用的权力。随着华中战局对日本逐渐不利，“接敌地区”日益扩大，“商统会”的征购范围也相对减少。上海资本家希望通过“商统会”来保证利益和稳定上海市场的想法落空了。

另一方面，即便如此，日本对商统会的表现还是不满意。“商统会”对大米、棉花、小麦的收购，从未达到预定的数量。其中因素很多，如战时农业产量的锐减，基层贸易组织粮栈的瓦解，收购价格的不合理以及地方抗日武装的阻挠等。但日本人是不会体谅这些的，反而通过报纸大力抨击“商统会”的腐败和无能。1944年5月，唐寿民辞去理事长职务，由闻兰亭担任，主要原因就是唐寿民对日方的干涉及在汪日矛盾的夹攻中无力应付。所以，美国学者认为，由“商统会”看日方、伪方和资本家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方利用伪方与上海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坐收渔翁之利，使两者都受他们的控制，并在运用上海财政经济资源方面左右逢源，保持操纵的地位。

1943年开始，东条内阁“强化国民政府”政策进入新阶段。但是，驻沪日军当局却阳奉阴违、敷衍搪塞。如日政府答应将直接关系人民生活的事业交还华商自主经营，但是，实际上只解散了一家华中蚕丝公司；又如日政府答应全部发还日军管理的工厂，但最后竟发生了日海军强制收买申新一、八厂的问题，震动了上海经济界。特别是日本大使馆上海事务所，继承了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控制上海市场经济的特权，始终千方百计利用特权。如在1943年日本大使馆上海事务所策划设立中日合办的证券交易所，公开在报纸上宣传并刊登招募经纪人的广告，同时唆使经营赌场的潘三省出面具文，组织理事会，并通知各经营证券及股票业务的商号向证券大楼登记，由日使馆发照，呈请伪实业部批准设立中日合办的证券交易所。因为当时中国交易法有明文规定，外国籍经纪人不准参加中国交易所，日本公使竟然要求伪立法院修改法律。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因利益所关，便直接致公函给日本公使堀内、经济顾问石渡提出质问，反对此事。为抵制日本使馆的经济阴谋，伪政权公布了“沪市华股整理办法草案”，并让旧商人沈长庚、张慰如等人恢复战前的“上海华商战前交易所”，专做华商战前证券交易业务，日本股票及公债不做。但由此可见日本驻沪军政机关的专横。

其二，人事矛盾与冲突。

日伪之间，虽是日本“喧宾夺主”，但涉及微妙的人事问题，其认识与举措也不一致。

对整个汪伪政府，日方都不是很满意的。比如，日本人常常公开指责汪伪政权是“不得民心、无能的政权，还是个由内室亲族势力逞强的团伙”。“汪政权的人员构成既没有从派阀亲族的框框中摆脱出来，也没有迎合民意的人才”，“汪政权不得人心所以是没指望的”母。对于上海市的伪政权，日人也抨击甚多，如日本人指责上海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中坚力量是CC团，

现在社会部是丁默邨领导的，他也是CC团的骨干。CC团是令人不寒而栗的组织，是恐怖活动的窝点”，“该委员会成立1年以来，实际做的工作连目标的一半也没有”，“这也是由于成员很多是地痞流氓本性难移，工作成现在这样也是必然的”。在日本人把租界还给汪伪政府后，租界工部局改为第1公署，日本人总结改组经验时认为：“在原来的组织力量基础上像从前一样由日本人掌握关键部门，而且要让中国官员有面子，所以运作时没有发生任何混乱。一如果新任干部拉帮结派，或者完全控制住自己的部门，……上海公署最终会变成官场腐败的、汪政权的人员机构延伸的行政厅，沦为罪恶累累的运营机构。”留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上海伪政权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在不同时段也是有区别的，以市长论，前期苏锡文是台湾汉奸，傅筱庵是亲日派，皆伏于日本侵略者的完全羽翼之下；后期陈公博、周佛海行事相对地更看重南京汪伪政权本身利益。

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面沦陷后，《申报》由以《蒋介石论》获得日人青睐的陈彬解主理，成为日本大使馆的喉舌。汪伪宣传部直属报纸伪《中华日报》，是汪伪集团的宣传中枢。

1943年5月25日，《申报》社论《两种亲日派》中有如是妙句：“第二种亲日派，开头就有着易于成为所谓汉奸的素质。他们多少懂得一点日语，又进而制造和日本人接触的机会，由此结成特殊关系，趁着战局混乱，任意为非作歹，有的利用官厅的名义捕人，勒索巨款，有的操纵金融市场，掠夺民众的积蓄。总之，凡威胁、敲诈、杀人等非法之事，无所不为。”这样痛骂汉奸的文字，以及不断抨击伪政府的文字，经常在日大使馆喉舌《申报》出现，使伪政府啼笑皆非。

1944年1月下旬，《申报》与《中华日报》的笔战，更突出地反映出日伪之间在人事问题上的矛盾与冲突。

这次笔战是因为上海物价飞涨引起的，最初是《申报》写了一篇社评，批判上海物价增涨不合理：“平区占沿海各地，为我国富庶之区，上海又工厂林立，生产所在地，上海的人口亦未见过于拥挤，而物价竟如是飞涨，若委罪于交通不便，试问交通何以不便？若归咎于市民囤积居奇，试问囤积居奇究竟谁是始作俑者……总之，政治之不上轨道，管理之不够清廉……实是物价风涨的内在原因。”为了反击《申报》的责骂，《中华日报》刊载了一篇胡兰成的论文《胜利第一》，反驳道：“值兹大东亚战事紧急关头，我们应该以战事的胜利为第一要图，一整顿吏治尚属次要步骤……现在竟然有人不顾念我们几经艰危锦绣和运的以往历史，妄加指摘……有损国府威信……那简直是渝方的第五纵队……”这些话虽是寡廉鲜耻，但在伪区却可谓用足了“高帽子”。但是，《申报》不肯就此罢休，照样针锋相对。翌日社评的标题是《革新第一》，争论道：“胜利固属要图，但此次战争为长时期之战争，长期战事非有善良之政治为基础，决难求胜利……欲求胜利，应以革新为第一，一高唱胜利，不务革新，又何异于舍本逐末。”双方你来我往，长论短评，互相谩骂。《申报》还承认，日军“交还租界”的企图，已被沦陷区人民的困苦生活所粉碎。为欺骗人民，该报传达日特务机关的宣传指示，将一切责任归于“人事问题”，公然主张将伪上海市长陈公博撤换，改以能“解除市民痛苦者为父母之官”。同时日华中派遣军机关报《新申报》亦于1944年3月14日著文申述同样意见，认为“上海市政实有一大肃正之必要”。日本官员则严厉指责“指望现在这些民众不信任的官员去掌握民心是不恰当的”，“日华合作的基础工作必须是，清理官场、训练官员、录用清官、开除赃官，同时重新组织民众”。虽然出于日军疯狂掠夺所造成的沦陷区人民实际生活的痛苦是决不能用“人事改换”改善了的，但日寇要将陈公博撤职，即明确地说明了敌伪之间的深刻矛盾。

其三，上海地区伪军建设过程中的日伪矛盾。

汪伪最初准备“建军”就是从上海开始的。1939年10月，汪精卫在上海江湾设置“军官训练团”，收容由日方移交的被俘国民党军官为学员，由汪精卫自兼团长，训练中下级军官，准备“建军”。开学之日，汪精卫题字“智深勇沉”为团训。1940年7月，汪伪又在上海市成立中央税警学校及税警团，税警学校由周佛海自任校长及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税警团先后由罗君强、李丽久、熊剑东等任正副总团长，后由周佛海自兼。其兵力开始有4000人，后发展到近万人。兵源一部分是收编的国民党税警团残部及忠义救国军，另一部分则是日伪俘虏的国民党官兵。该部名义上虽然称税警，实际上则是一支经过训练的军队，其装备在伪军中也是较优良的。日军最初之所以支持周佛海发展武装，一是满足周的个人野心，在汪伪集团中树立派系势力，便于分而治之，以利操纵；二是企图以税警团的名义，在适当时机代替日军接收和控制上海法租界。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法

国贝当政府投降德国，日方才改变了对法租界的态度。后来，日军对税警团很不信任，害怕一支拥有数千人的武装长期驻扎在上海会给日军造成威胁。因此，只将一部分留在上海，大部分则派往浙江余姚及江苏、浙江两省地区，担任盐场警卫及参加反共清乡。

伪方扩军是得不到日方占领军的准许的，只得采取叶底偷桃的手段。陈公博就任伪市长后，借口整编保安团队，原拟扩编成为两个“保安师”，但日军不允，限制每个县只准设一个保安大队，由伪县长兼任大队长。伪上海市保安司令部只准直辖特务大队、补充第一第二大队、警卫中队等，合计不到两个团的兵力。1943年2月至5月，日伪开始春季整军，日军仍然不肯放弃大队编制的原则，仅仅允许各个大队的内部编制稍加扩大，例如1个大队可辖5至6个中队等。这样，伪上海保安团队合计约6千余人，成为陈公博统治上海的基本势力。

1940年初秋，驻上海的日本陆军部队通过军事顾问部向汪伪提出一份“肃清方案”，希望汪伪配合日军，把一些出产丰富的地区“治安”搞得更好一些，目的在于肃清各地区内的敌对的政治或军事势力，以利于日军的经济榨取。上海自然也是主要被“肃清”的地区之一。1942年6月，日伪成立“上海特别市清乡筹备委员会”，从事制订各种计划方案，以及军事封锁等准备工作。8月1日，成立“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陈公博兼任主任，试图把“党政军熔为一炉，完成一元化之组织”。由此可见，日伪通过清乡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不同的。在上海地区的清乡过程中，日与伪及伪与伪之间的矛盾依然严重存在。日本侵略者在清乡过程中采取扶植多头的政策，企图建立嫡系伪军；而汪、周、陈也试图扩充自己的私人势力，四方面实行争夺，大批收买拉拢地痞流氓土匪为己所用。及时利用日伪矛盾是当时游击队打破敌人清乡的重要一环。

综上所述，上海地区日伪关系是沦陷区史研究中饶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之间有狼狈为奸的合作，也有勾心斗角的纠缠，由此，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审视当时日伪对上海社会进行统治的各种方式的轮廓，加深对这一时期历史的认识。

责任编辑：季鹏